

雙語教育

TAIWAN EDUCATION REVIEW February



雙語學校與雙語教學

教育發展與教育政策 雙語學校與雙語教學

台灣教育

2020 雙月刊 No.721

TAIWAN EDUCATION REVIEW FEBRUARY 2020

1952年1月10日創刊

2020年2月15日出刊

發行人：簡明忠

社長：陸海芳

總編輯：黃政傑

輪值主編：黃政傑、成群豪

執行主編：曹翠娥

編輯委員：

王立心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王智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王麗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教授

成群豪 華梵大學退休總務長、助理教授

宋修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教授

李懿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教授

幸曼玲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吳怡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嬰幼兒保育科助理教授

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林新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名譽教授

洪雯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教授

高新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退休教授

張芬芬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張郁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郭添財 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黃明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終身榮譽教授

湯堯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葉興華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劉春榮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名譽教授

劉鎮寧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

鍾宜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編輯助理：黃馨誼

封面設計：傅玥萱

會址：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51號2樓

電話：(02) 2351-9671

傳真：(02) 2357-7773

網址：<http://www.tpea.org.tw>

Email：editor@tpea.org.tw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2424號

臺北郵局臺北雜字第1777號登記為雜誌類



台灣教育

1952年1月10日創刊

第 721 期

2020年2月15日出刊

i	主編的話
	主題一文章／雙語學校與雙語教學
1	反思雙語教育：從新加坡的雙語經驗看臺灣的政策與作法／林子斌、袁家凱
13	雙語教育－認同、策略與人才培育／陳美如、曾莉婷
25	反負為正？由隱性雙族裔民族談雙語及多語教育／陳美瑩
	主題二文章／課綱實施的地方責任
35	地方政府因應新課綱的思惟與作為－課程領導觀點／吳俊憲、吳錦惠
43	地方政府推動新課綱的責任與展望／郭添財、王全興
51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與地方學的相遇：高中「地方學」校訂課程的實踐意義／薛曉華
	專論文章
61	職涯發展為導向的美國高中課程改革-以俄亥俄州為例／張仁家
75	論日本「社會 5.0」與教師終身學習－以運用 ICT 為例／申育誠
89	推動校園健康促進，涵養關鍵復原能力／謝為任、謝文英

- 99 新北市 108 年度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試題解析／張信務
- 121 稿約
- 122 2019-2020 本刊各期主題及截稿日期
- 123 第 723 期主題撰稿說明

近年來，國內中小學教育有兩大政策受到各界重視。其一為雙語教育，政府推動雙語國家政策，在教育上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地方政府仿效其他國家全力配合辦理雙語學校，實施雙語教學。但我國社會文化背景和國外雙語國家不同，推動起來勢必遭遇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連何謂雙語教育都會出現爭議。至於如何實施還需要仔細考量和規劃，其中師資問題顯而易見，課程如何設計，教學如何實施，都需要好好探究。

其二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自 2019 學年度起，在國小、國中、各類型高中逐年實施。新課綱歷經將近十年的研發及審議過程，始於去年全部定案，其中提出自發、互動、共好的願景，總綱繼以核心素養的培育引導各領域和學科課綱的修訂，並規劃議題融入、探究實作、跨域教學、自主學習等改革焦點。新課綱的實施需要各項配套措施才能落實，中央、地方和學校三方都要共同準備，其中做為中小學主管機關的地方政府，責任尤其艱鉅。

針對這兩大教育政策，本刊規劃雙語學校與雙語教學、課綱實施的地方責任兩大主題，邀請專家學者撰文，探討相關學理、案例、經驗和問題，提供解決問題的建議。另外，本期專論文章亦刊登美國高中職涯導向的課程改革、日本 AI 科技發展及教師終身學習兩篇文章。這些文章都頗具參考價值。

本期之出刊，首先感謝作者在百忙中撰寫專文，以饗讀者。其次要感謝審查委員提供各文修訂的寶貴意見。最後，感謝編輯部同仁的辛勞，用心且及時完成使命。

黃政傑
成群豪

2020 年 2 月

反忠雙語教育：從新加坡的雙語經驗看臺灣的政策與作法

林子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黃家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博士

壹、前言：雙語教育是風潮還是良藥？

學習英語的風潮，在東亞地區是非常普遍之現象，臺灣亦無例外。早在 1998 年臺灣教育部已將英語課列入國小正式課程，並於 2005 年起小學三年級學生每週需上兩節英語課，然而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學生英語力未盡理想（林曉雲，2018）。更甚者造成英語學習之雙峰現象，使教育無法促進階級流動，反而加劇階級的分化（王昱培，2019）。

臺北市柯文哲市長於 2018 年 3 月指出，臺北市將在國中小階段導入雙語教學，並於 2018 學年度起增加試辦雙語教學之中小學數量，並責成教育局派員至新加坡進行考察（梁珮綺，2018）。緊接著於 2018 年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宣示自 2019 年起，我國將正式啟動雙語教育，透過「雙語國家」政策，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短期將以「雙語國家」為政策目標，終極目標則為「英語為官方語言」（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因此，2018 年 12 月 6 日行政院發布「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據此，教育部提出以「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為目標並透過 5 大策略，強化學生在生活中應用英語的能力及未來的職場競爭力（教育部，2019）。一時間「雙語教學」、「雙語教育」、「雙語國家」成為大眾討論的熱門話題。

然而，在深入熱門話題前，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是，自 1998 年將英語課程列入國小正式課程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學生英語能力並未因此表現突出。英語作為我國中小學階段唯一必須修習的外語（Wang & Lin, 2013），在多年推動後仍有許多值得改進之處，因此「雙語教育」政策被提出作為一種解方，但這又是

「一股熱潮」，還定能列府央語能刀貝貝從并之良樂，還但待史多付細的推取與休究。新加坡在亞洲被公認為雙語教育最成功之地，而且與臺灣類似皆屬華人為主體的社會。新加坡過去數十年的發展經驗是否可以提供臺灣一個好的參照與反思當前雙語政策作法的起點呢？這是本文撰寫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本文首先介紹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的發展脈絡，其次分析其推動成效與挑戰，並比較我國與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及作法之異同。最後，透過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的經驗，借鑑其成功經驗，並進一步反思我國推動雙語教育的可能性與目前政策之盲點與衝突。

貳、新加坡雙語教育發展脈絡：充滿挑戰的漫漫長路

新加坡在 1965 年獨立建國之前，屬於馬來西亞聯邦之一，故其名義上的國語即為馬來語，儘管馬來語在新加坡獨立後，仍維持其名義上的國語，但在國家雙語教育中，英語及母語才是其語言政策之重要核心。尤其獨立建國之初，新加坡始終存在潛在的種族分裂及政經動蕩的威脅，為了建立國家意識、發展經濟建設、維持種族和諧，語言政策成為關鍵因素（陳志銳，2013）。對新加坡而言，英語是工具、母語是文化、國語則具象徵性意義，各種語言所代表的意義與功能不同，然而國情才是決定新加坡雙語政策發展的關鍵（李光耀，2015）。

將英語與母語作為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的二個重要核心，有其獨特發展的歷史脈絡因素。新加坡人口組成多元，是一個擁有多元種族及文化的多語社會，而為了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宗教及語言的平等國家，其雙語教育並非僅代表著英語及華語，而是英語與各族群所使用之母語（mother tongues）。不同於馬來語、華語及淡米爾語，英語作為新加坡四個重要的官方語言之一，其不屬於任何一個主要族群所使用的母語語言（林子斌，2017），主要肇因於 18 世紀新加坡由英國殖民時期，島上各族群即以殖民統治菁英階級所使用之英語作為彼此溝通的共同語言。此外，對新加坡政府而言，對內英語不專屬任何種族，對外英語是國際外交、經貿工商的共同語言，除可安內，亦可推動國家國際化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發展（陳志銳，2013）。

從國家歷史發展角度、作為吸收科學與技術教育知識的重要媒介、發展外交與經濟等多重優勢下，新加坡選擇英語作為促進國家建設與發展之工具語言（李光耀，2015）。2019 年世界競爭力排名報告顯示（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2019) 在詞宜的 05 國中，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推翻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同時，2018 年世界人才競爭力排名報告也顯示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2018)，新加坡排名第十三名，亞太區排名第一，其中語言能力技術排名世界第八，語言對於國家發展及競爭力的提升極具重要。李光耀 (2014) 即指出，新加坡勞工因雙語教育所具備良好之英語 (第一語言) 及華語 (第二語文) 能力，是促進其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新加坡在推動雙語教育的道路上，也曾經面臨許多挑戰。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李光耀，2015)，這在多元族群社會所組成的新加坡中，更突顯出國家權力對教學語言媒介操弄與規範的痕跡 (Wong, 2002)，尤其語言涉及族群認同，語言政策往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Gopinathan, 2013)。李光耀曾指出 (2015)，儘管新加坡是一個中央集權、具有高效能的政府，然而雙語教育的推動並非一蹴可幾的，即便在 1965 年就決定以英語為全國共通之工作語言，但在社會、政治大環境的條件未成熟之下，一直努力到 1979 年《吳慶瑞報告書》發表後，才透過「分流 (streaming) 制度」努力使學校朝向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體制。而且，新加坡到 1987 年才確定全國學校 (除特選學校外) 皆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盧丹懷 (2005) 指出，雙語教育是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的媒介語言，使學生通過運用授課語言達到掌握兩種語言的最終目標。不同於「語言教育」(language education) 是通過學校教育體系學習語言課程，「教育語言」(language in education) 則是傳授知識時被用作媒介的一種具體語言，其不是學習的目的語，而是作為傳遞信息的中介。雙語教育的核心概念是同時採用兩種語言作為課堂教學的媒介語，讓學生在課堂中透過這兩種語言吸收知識，並在學習過程中使用目的語而達到掌握目的語的最終目標。

在《吳慶瑞報告書》中指出，近三成的新加坡學生無法適應雙語教學環境。在學校能適應的學生，也無法同時精熟兩種語言 (Tan, 2011)。新加坡在推動雙語教育五十年左右的歷程裡，由於華語 (中文)、馬來語、淡米爾語 (Tamil) 既不是政府部門工作語言，也不是政經活動交際語言，僅僅是個別族群傳承族群文化和維繫族群交流的共同語言，三個族群語言在社會上之地位遠不及英語 (吳英成，2010)。尤其，當大眾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往來文書資料，皆以英語為唯一的使用語言，以逐級篩選菁英做為教育主軸的新加坡，英語漸漸成為邁入菁

自從 199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崛起帶動華語在全球經濟市場、國際政治外交上的重要性，華語逐漸成為另一種強勢語言，這個現象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及國家競爭力優勢，讓新加坡進一步思考該如何調整其雙語教育政策（吳英成，2003；Goh, 1999；Gopinathan, 2015）。雖然新加坡政府一再強調雙語的重要性，但政策上仍以英語為主，已經造成新一代華人在華語的讀寫及口語表達能力持續下降，在華語全球地位日漸顯著之時，此一現象已引起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吳英成，2010）。因此，新加坡在《吳慶瑞報告書》奠定新加坡華語教學的基本框架後，因應國內外情勢，還針對其雙語教育政策陸續進行幾次重大改革。幾個主要政策敘述如下：1992 年《王鼎昌報告書》側重於提升新加坡學生華語科整體水準，彌補因分流制度造成學生學習高級華語的困難；1999 年《李顯龍政策聲明》重視因材施教；2004 年《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國會白皮書》強調提升學生對華語的興趣；2010 年《樂學善用—母語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則是重視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吳英成，2010；陳之權，2013）。整體而言，華語教育作為新加坡雙語教育重要的一環，新加坡透過與時俱進的改革方案，彈性且靈活地調整國家雙語政策及雙語教育的目標與內涵，取消分流制度、因材施教、差異化教學法的實踐，乃至於學以致用等，增進了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的效益。

綜上所述，可以瞭解在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實踐上，是有其獨特之英國殖民地歷史背景與多元族群之複雜社會、政治脈絡，並加上將近五十年的時光，方有今日的雙語新加坡。尤其，從新加坡花費近五十年的時光，才有如今不盡完美但基本成功的雙語教育果實，此也提醒身在臺灣的我們，除了縝密思考制訂政策，輔以詳盡的配套措施外，萬不可忽略推動雙語教育關鍵的「時間」要素，急就章的結果是達不到政策成功的目的。

參、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兩大議題：國際化及文化認同

雙語教育是新加坡教育體系的基石，英語作為教學的共同語言，促進新加坡學生融入全球化的世界，並在經濟上創造出對國際商業有利的環境，而母語學習則型塑族群及文化認同。換言之，雙語教育政策對新加坡之族群治理，扮演關鍵之角色（Gopinathan, 2013）。此外，雙語教育政策的成功絕非政策口號或

監圖可以達到的，則取決於國民對待本身語言的心態、學生學習母語的能力與態度，才是政策成敗的關鍵（陳之權，2013）。

新加坡雙語政策的實踐，除安定國內族群和諧穩定之目的外，同時也著眼在推動國家發展國際化及提升國際競爭力。2019 年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5）（Yeandle & Wardle, 2019）結果顯示，新加坡僅次於紐約、倫敦、香港之後，排名全球第四名，顯示出新加坡經貿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及其影響力。然而，國際化除了表現在經貿的繁榮外，也實質反應在新加坡教育成果上。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結果顯示，新加坡國立大學全球排名第 23 名，亞太地區排名第 2 名，僅次於中國清華大學；在 2020 QS 世界大學排名（QS Top University, 2019）結果顯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並列第 11 名，並在亞太地區排名第 1 名。在人才全球競爭的影響下，高等教育國際化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發展趨勢，同時，國際化程度亦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並能提升一個國家總體競爭力。致力於成為亞洲高等教育重要樞紐，新加坡在高度國際化效應下，陸續吸引多達 16 所的國外大學在新加坡設立海外分校（Mok, 2011），此即顯示出新加坡雙語教育對於推動教育國際化所展現之實質成果。這樣的成果來自於新加坡語言政策的有效規劃與執行，以及在語言師資培訓的努力（Low, 2014）。

新加坡的雙語政策，係從學校課程著手，從小學到大學之課程，除母語課程外，皆以英語為第一語言進行各科目之教授，透過「教育語言」作為知識傳遞的媒介，讓學生在課堂中吸收知識的同時，也因為使用英語而熟悉英語的目標。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所使用之文書、出版書籍、大眾傳播媒體等，皆以使用英語為主，建構一個實質的雙語環境，這是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的成功因素。

然而，在國際化表現強勢的結果，雙語教育的實踐充滿不同之挑戰。如前所述，雙語教育的推動，讓英語與母語成為學校分流的依據，此種現象代表在高度競爭的新加坡社會中，具備優異雙語能力的學生，才有機會進入菁英階層。換言之，語言能力的良窳成為社會階級流動的一個關鍵與指標。因此，當英語成為優勢語言，這樣語言的發展勢必影響新加坡社會發展。當新加坡政府於 1980 年將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合併為一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的向守教員正式進入英語為主的時代。而土安的公告體系，亦定以英語為共同工作語言。這些現象造成講華語且無法流利使用英語的大學畢業生，未來在社會上將無法獲得較佳的工作機會（梁秉賦，2017）。也因此，學生未來若想取得更好的社經地位，精通英語為必然的結果（吳英成、馮耀華，2017）。陳之權（2013）即指出，1987 年之前新加坡中小學中，英校與華校並存著，然因英語的使用關係著個人職涯發展、社會地位等因素，尤其，家長深刻瞭解到掌握英語語言關係著下一代生存與發展，紛紛將孩童送進英校，華校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最終走入歷史。

為能繼續維護母語維繫族群認同與文化傳承的價值，新加坡政府積極為扭轉華校小學生人數急速下降的勢趨，1979 年起對 28 所華語小學實施「特別輔助計劃（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提供學校額外設備，並調派優秀的英語教師至學校任教。同時，新加坡政府將 9 所傳統華語中學選為「特選中學」，參加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成績最好、學術成績表現優異的 8% 的學生，可選擇進入這 9 所特選中學。特選中學係為精通母語（這裡特指華語）及英語的學生設立的中學教育課程，故進入特選中學的學生，必須修讀華語和英語皆為第一語文的「特別課程（special course）」。至 2012 年止，特選中學的學校數已增加至 11 所（鄭昭榮，2017；李光耀，2015；Gopinathan, 2015）。除了特選中學，新加坡政府雖在 1985 年停止招收非英語源流的小一學生，但允許其中四所特選中學的附屬小學為「種子學校」，繼續以華語和英語並列為第一語文，更在 1989 年將種子小學增加至 10 所並改稱種子小學為「特選小學」，至 1992 年特選小學已增加至 15 所（鄭昭榮，2017）。

由於進入特選中學學生素質佳、學術表現優異，且透過政府給予的特別輔助計劃，也讓特選中學學生更具競爭力，在新加坡教育部於 1992 年首次公布的中學排名即可看出，排名前 10 名的學校中，即有 6 所來自於 9 所特選中學，表現極為優異（李光耀，2015）。然而，進入特選學校的學生，基本上屬於雙語能力（尤其是華語）優異的學生，對於更多學生而言，華語能力則相較弱勢，英語仍為其主要慣用語言。此也顯示出，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對新加坡國民的語言態度產生影響外，對華人社群而言，家庭用語的使用，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脫華入英」效應持續發酵中。吳英成、馮耀華（2017）指出在小一新生在加慣用語言之調查中，1990 年有 67.9% 的學生在家使用華語，但之後逐年

遞減到 2009 年的 40%。這些放棄華語的家庭，卻轉為英語為家庭主要用語。英語甚至在 2004 年超越華語，成為 47.3% 的小一新生在家戶中所使用之主要語言（吳英成、馮耀，2017）。此外，延晶（2016）針對 36 位就讀新加坡鄰里小學華人學生優勢語言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受測者之優勢語言為英語，受測者使用英語表達思維更加流暢，英語也逐漸成為思考的語言。此結果不同於過去研究認為華語是溝通交際的語言，英語是讀寫的語言，調查結果更彰顯出雙語教育對於家庭用語樣貌轉變的影響。

換言之，雙語教育除在國家層級具有影響力，同時也改變家庭用語的樣貌。儘管推動雙語教育的初衷，係建立在安定國內族群和諧穩定、維繫族群認同與文化傳承的價值，同時也在推動國家發展國際化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但仍然不可忽視作為優勢第一語言的英語，其在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政策中具有強大之影響力。對華人社群家庭而言，雙語教學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家庭語言環境的變化。儘管華人英語能力得到了提升，然而其華語能力的發展相對落後（延晶，2016），華語教學正經歷著從第一語言教學向第二語言/外語教學的方向轉變（吳英成，2010）。

雙語教育政策的實踐在新加坡國家發展及族群治理上，確實具有重要性及影響力。然而，從長期發展結果來看，母語（尤其是華語）則呈現出非預期的發展。因為英語作為強勢語言對個人之未來職涯發展有明顯助益，故造成脫華人英現象逐漸形成。儘管新加坡政府透過實施「特別輔助計劃」及「特選學校」，希冀提升學生雙語（英語及華語）的使用能力，但僅對菁英學生有所助益。對於多數非菁英學生而言，雙語教育的效益是否如預期，其效用是否擴散仍有待商榷。過去近五十年雙語教育政策的成果，近年來卻給新加坡政府帶來新挑戰。由於中國的崛起帶動華語之重要性提昇，並與經濟發展緊密相聯。因此，該如何維持目前英語優勢，又能增進學習華語之動機並進而培養華語能力，是新加坡雙語教育當前急迫需處理之議題。

肆、臺灣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之路：從新加坡經驗反思

臺灣將英語課列入國小正式課程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然而英語教學向下延伸真的有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嗎？作為中小學教學現場中雙峰現象最嚴重的

領域之一（吳旭磊，2019），如何提升臺灣下一代之英語能力，一直是教育現場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曾針對臺北市上萬名小六學生英語能力檢測，結果顯示在詞彙、聽力及閱讀理解等項目中，近 1/4 學生達到未達國小 6 年級應有程度，在文法句型的表現則有近半學生未達國小 6 年級應有程度（林曉雲，2018a,2018b）。可見在語言教育之政策與實踐上，臺灣還有許多可以加強之處。

臺北市於 2018 學年度起增加試辦雙語教學之中小學數量與行政院自 2019 年起正式推動雙語教育，兩者皆試圖提升英語能力與學生之學習成效。增進國人英語能力的雙語教育政策，在立意良好的前提下，是否有相對應的良善作法使政策能有實際成效並不會出現未預期的效果，這是檢視政策時，必須考量的兩個重點（Ball,2006;Rizvi & Lingard, 2010）。

首先，從雙語教育的概念來看，臺灣係將英語視為「語言教育」，是一種透過學校教育體系學習語言課程，是一種學習的目的語。不同於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係將英語與母語同時放在官方語言的位置，並將雙語作為工具語言，在教育體系中作為媒介語言，讓學生在通過運用授課語言達到掌握兩種語言的最終目標。透過「教育語言」作為傳遞信息的中介，學生在課堂中透過這兩種語言吸收知識，並在學習過程中使用目的語而達到掌握目的語的最終目標。兩者對英語的功能與屬性界定不同，對雙語教育的推動也將有著不同結果。從《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指出，我國在推動雙語國家政策中，係以 2030 年為目標，短期係以打造我成為雙語國家，提升國人英語力，增加國家國際競爭力，至於是否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則要於 2030 年後，視雙語政策推動的成果執行檢討後再行研議。與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相較，臺灣雙語教育政策在主動性與強制性這兩方面更為不足。

其次，新加坡將英語作為其官方語言且為優勢語言，有其獨特的歷史脈絡因素。由於新加坡是一個擁有多種族及文化的社會，為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宗教及語言的平等國家，將英語、馬來語、華語及淡米爾語等四種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其雙語教育並非僅代表著英語及華語，而是英語與各族群所使用之母語。英語列為官方語言，除肇因於英國殖民之歷史因素，因為當時島上各族群即以殖民統治階級使用之英語作為共同語言。此外，英語不專屬新加坡國內任何種族所使用之母語，採用英語可避免掉偏好特定族群之母語的爭議。第三，英語

定國際共通之語言，對於推動國際外交、經貿發展，並提升國際化及國際競爭力具有其重要性。在《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策文本中揭示，其設定之目標為「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從提升國家競爭力角度而言，與新加坡不謀而合，英語作為國際共通語言，對於國家發展、推動國際化，確實有其必要性與功能性。然而，在臺灣日常語言使用中，中文仍壓倒性地為民眾普遍使用之語言。從前述新加坡的例子觀之，語言使用的社會定位不同，勢必導致語言生態的轉變，英語對大眾生活的使用上是否有其必要性或正當性，仍須進一步考量。

臺灣語言政策的發展歷程中，也有相關例子可供進一步探討。以原住民族語言之教育為例：臺灣近年來對振興原住民族語言投注大量資源，一方面反應出過去推行中文為強勢語言所造成的原住民族語流失的問題。在推動國語為臺灣第一語言過程中，原住民族的語言、認同與文化皆受到極大的挑戰。類似的現象亦出現在新加坡的雙語教育上，只是新加坡在推動雙語教育的過程中，英語為優勢的第一語言，造成華語的能力與使用持續下降。新加坡政府為提升華人社群使用華語的能力，亦開始投入資源如「特別輔助計劃」、成立特選學校等，但這些措施成效仍有待檢驗。臺灣推動雙語教育之時，是否已認真考慮語言變遷所帶來之深遠社會、文化與認同的影響？在目前臺灣對雙語教育政策的討論中，這類論述明顯缺席，然而這卻是政策制訂過程中應該認真檢視的環節。

第三、從前所述可見新加坡在推動其雙語教育時有縝密的規劃、適時的調整，以求符合國家需求與社會脈絡。反觀臺灣一方面希望透過雙語教育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但是在剛上路的 108 課綱中，國中英語教學時數不增反減，從一週四節減成一週三節。在減少英語授課時數的情況下，卻希望推動在國中小以英語教數學、藝文等領域科目，這明顯的是種本末倒置的作法。由此可見，雙語教育政策的規劃與十二年國教課綱並未同調，這樣有內在衝突的政策放到國中小，會讓第一線的現場教師們無所適從，更減少政策可能的效力。

伍、結語

語言對於促進國際化具有其重要功能，同時必須配合環境的建構才能發揮其最大效益。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雙語教育配合國家雙語環境的建構，如大眾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往來文書資料，皆以英語為唯一的使用語言，確實將英

苗雅玉優秀語言的地位，也具體促進了國家賦予其與國際化的實踐。在語言的學習上，絕非僅透過學校教育可以成就，整個國家雙語環境的建置絕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策文本中揭示，以 2030 年打造臺灣成雙語國家為目標，其理念、立意方向是正確與良善的。強化提升全民英語軟實力、營造雙語化硬體環境，這對於推動雙語國家的實現是可行的方向與作法。然而，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新加坡推動雙語國家歷經半個世紀的努力，並且因應時勢所需，謹慎地在適當時機透過政策規劃與執行。反觀我國，距離 2030 年僅約 10 年左右的時間，政府是將 2030 年視為階段性目標，亦或終極目標，政策實踐的結果將會呈現不同的樣貌。本文的作者非常同意英語的重要性，也肯定雙語教育的立意良善，然而若要有可實踐、有效用而且不把學生當成實驗白老鼠的雙語教育，根據本文由新加坡的經驗來反思臺灣，我們的雙語教育政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作為亞洲公認雙語教育最成功之地的新加坡，我們能看到其推動雙語教育所面的困難與挑戰，國內在推動雙語政策時，如何避免重蹈新加坡的覆轍，並能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有賴政府機關審慎思考與規劃。

參考文獻

- 王昱培 (2019 年 2 月 18 日)。莫讓雙語教育成為「階級再製」的機器。天下雜誌。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767>
- 吳英成 (2003)。全球華語的崛起與挑戰。語文建設通訊，73，46-54。
- 吳英成 (2010)。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沿革與新機遇。臺灣語文研究，5 (2)，63-80。
- 吳英成、馮耀華 (2017)。落地生根的胡姬花：新加坡華裔語言形態與身份認同解讀。臺灣華語教學研究，14，29-41。
- 李光耀 (2015)。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臺北市：時報文化。
- 延晶 (2016)。新加坡雙語小學生的優勢語言。華語文教學研究，13(2)，89-108。
- 林子斌 (2017)。新加坡教育的發展探究 – C 到 A+ 的歷程。載於溫明麗 (主編)，亞洲教育的挑戰與展望 (頁 111-136)。臺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 林曉雲 (2018a)。台師大調查小六英文能力 逾半文法句型未達標。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39593>
- 林曉雲 (2018b)。台師大檢測 部分未達小四程度。自由時報。取自

-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取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B2F95FF15B21D4A&upn=5137965B2A81A120
- 教育部 (2019)。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Plan_Content.aspx?n=D33B55D537402BAA&sms=954974C68391B710&s=FB233D7EC45FFB37
- 梁秉賦 (2017)。開智啟蒙 薪盡火傳－從華文教育到華文教學。載於康格溫 (主編), 70 周年紀念特刊 (頁 94-100)。新加坡: 新加坡華文教育學會。取自 https://www.sces.org.sg/files/5_Chapter_5_.pdf
- 梁珮綺 (2018 年 3 月 16 日)。北市雙語教學 107 學度再增 4 校。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803160087.aspx>
- 陳之權 (2013)。新加坡獨立以來各階段華文課程與教學改革重點及其影響與評價 (1965-2010)。中原華語文學報, 11, 73-97。
- 陳志銳 (2013)。從雙語到雙文化: 新加坡的華英雙語詩歌。中國現代文學, 23, 111-132。
- 鄭昭榮 (2017)。早期的華校與特選學校。載於康格溫 (主編), 70 周年紀念特刊 (頁 101-102)。新加坡: 新加坡華文教育學會。取自 https://www.sces.org.sg/files/5_Chapter_5_.pdf
- 盧丹懷 (2005)。香港雙語現象探索。香港: 三聯書店。
- 鍾榮富 (2008)。新加坡華語的特色與文化在教學上的角色。華語文教學研究, 5 (1), 1-28。
- 黃旭磊 (2019)。雙語教學 教育界要求能力分班。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61890>
- Ball, S. (2006). *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al class: the selected works of Stephen J. Ball*. London: Routledge.
- Goh, Y. S. (1999). Challenges of the rise of global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4(3), 41-48.
- Gopinathan, S. (2013).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The selected works of S. Gopinathan*. London: Routledge.
- Gopinathan, S. (2015). *Education*.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2018). *IMD world talent ranking 2018*. From https://www.imd.org/globalassets/wcc/docs/release-2018/talent-2018/talent_ranking_2018.pdf
-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2019).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19*. From <https://www.imd.org/contentassets/6b85960f0d1b42a0a07ba59c49e828fb/one-ye>

- Low, E. L. (2014). Singapore's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a foundation for its educational success. In S. K. Lee, W. O. Lee, & E. L. Low (Eds.), *Education policy innovations: levelling up and sustaining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pp. 85-102). Singapore: Springer.
- Mok, K. H. (2011). The quest for regional hub of education: growing heterarchies, organizational hybridization, and new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6(1), 61-81. doi:10.1080/02680939.2010.498900
- QS Top University (2019).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
- Rizvi, F., & Lingard, B. (2010). *Globalizing educatio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 Tan, C. (2011).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reforms in Singapore. In W. Choy & C. Tan (Eds.), *Education reform in Singapore: Critical perspectives* (pp. 13-27) . Singapore: Pearson.
-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9/world-ranking#!/page/0/length/100/sort_by/rank/sort_order/asc/cols/stats
- Wang, L., & Lin, T.-B. (2013).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in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Recruitment Polic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Japan, Korea and Taiwan.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 12(3), 5-22.
- Wong, T. (2002).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
- Yeandle, Mark & Wardle Mike. (2019).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ongfinance.net/programmes/financial-centre-futures/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gfci-publications/the-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25/>